



中国·义乌故事丛书 | 牛建农主编

义乌智慧

牛建农 吴浩军 陈红◎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中国·义乌故事丛书|牛建农主编

义 乌 智 慧

牛建农 吴浩军 陈 红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8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地回顾了义乌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介绍了义乌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深入挖掘、颂扬了义乌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人文精神、团结奋斗精神、农商并举的创新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 and 节俭务实精神,并指出上述精神一脉相承、发扬光大,为义乌人民在改革开放年代创造发展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

本书适合宣传工作者、经济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各级干部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乌智慧 / 牛建农等著. —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8. 9

(中国·义乌故事丛书/牛建农主编)

ISBN 978-7-5641-7969-4

I. ①义… II. ①牛…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3628 号

书 名: 义乌智慧

著 者: 牛建农 吴浩军 陈 红

责任编辑: 徐步政

邮箱: 1821877582@qq.com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 江建中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排版: 南京布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5 字数: 190 千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7969-4

定价: 39.00 元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或传真: 025-83791830)

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吴浩军

副主任 阮梅洪 杨文挹

委 员 吴浩军 阮梅洪 杨文挹 吴广艳

张立文 曾志强 牛建农

总序

编写这一套“中国·义乌故事丛书”，我们的主旨在于总结、介绍义乌经验，讲述义乌故事。

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可以从各式各样的文化背景、发展理论出发。最常见的情况是从传统发展方式（或称工业文明发展方式）出发，用传统发展方式的理论和标准体系来套义乌实际，这样做省心又省事。然而，问题在于：义乌的发展奇迹并不是按照传统发展方式创造出来的。义乌的发展奇迹是义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年代，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方式创造出来的典型，而不是传统发展方式指导下的以物为本的案例。总结义乌经验，必须从义乌实际出发，不能张冠李戴。

历史上有很多精彩的战例，比如围魏救赵、淝水之战、赤壁之战，通过这些战例，人们可以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发展方式也需要“战例”。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必须总结各地的好经验，比如义乌奇迹、华西村经验、永联村经验、洛川发展苹果产业的经验、东阳花园村经验等，汇成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例库”。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应该从中总结、提炼出一整套以人为本的评价体系，以此来衡量我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否则，一面说践行科学发展观，一面又只有别人的案例、只有以物为本的评价体系，只能用以物为本的评价体系来套我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这种扭曲与脱节的现象于我们伟大的事业十分不利。

我们在推进科学发展，这是前人和洋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总结经验也好，形成评价体系也好，都只能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从人民的实践中总结、创建。

这一套“中国·义乌故事丛书”，主要是讲事实，讲义乌人民创造发展奇迹的实实在在的事。我们选取了几个不同的角度，即“三农”（农民、农业、农村）发展的角度、历史文化的角度、美丽乡村建设的角度、城市发展的角度和工业发展的角度等等，希望能立体地、全面地展现义乌人民的精神、智慧和他们的业绩、经验。

事情要靠人来做，人民需要自己的带头人。2018年1月11日，《浙江日报》刊载长篇通讯《功成不必在我 福祉留于百姓——记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义乌老干部谢高华》，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新时代呼唤更多“谢高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1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以整版篇幅刊发长篇通讯《离开义乌30多年，这位退休厅官为何有这么好口碑》，发布不到10个小时，新华社公众号平台点击阅读量就超过了100万次。金华和义乌的报刊，随之连篇发表报道谢高华先进事迹的文章。由此，总结义乌经验、讲好义乌故事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突出特点将是以人为本。

牛建农

前言

义乌之所以引起全球广泛而又持久的关注,并不在于它一年能创造多少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不在于它那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面对义乌创造的发展奇迹,人们最想弄明白的是:像义乌这样一个既不沿边又不靠海,既没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又不是交通枢纽,既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又没有外来企业或国家大项目从天而降的贫困农业县,是如何一飞冲天的?

理论界、学术界早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历史文化是“软实力”,是重要的资源、资产、资本。历史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类似“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是产品的灵魂”这样的说法,也已经被广泛地宣传和接受。

为了发挥“软实力”和“灵魂”的作用,将资源变成财富,常规的做法是由有学问的人查阅历史文化典籍,从中寻找可以为当下所利用的资源。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行为定式。在发展旅游业的策划或规划中,已经成为必用之法。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总结、阐述义乌经验,证明历史文化积累是推动义乌创造奇迹的重要力量,显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为此,学者们写了许多文章,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然而,义乌的事实令人困惑:1982年,当义乌人开办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出台“四个允许”政策、制定“兴商建县”发展战略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没有花多大力气去查阅县志、文化典籍或乡贤遗著。

于是,一个难题横在面前:义乌的历史文化积累是如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推动了义乌奇迹的创造过程?

在书本上记载的历史文化与义乌人创造发展奇迹的鲜活事实之间,应该有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什么?在哪里?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对义乌的历史做了再一次的系统回顾,从史前文明直到改革开放。与前不同的是,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名不见经传的老百姓身上。我们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在义乌历史进程中、文化创造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做的贡献;在义乌兵和敲糖帮这两个义乌农民群体身上,我们用了许多笔墨;我们还用了很大的力量,写下了本书第四章《流淌在大地上的文脉》,记述义乌农民在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与文化艺术创造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现了那一座连接义乌历史文化与义乌发展奇迹的桥梁。

目录

总序	4
前言	5
第一章 灿烂的史前文明	001
第一节 浙江在我国史前文明发展中的重大贡献	001
第二节 金衢盆地是浙江史前文明的源头	004
第三节 义乌是金衢盆地的“龙头”	013
第二章 光耀古今的爱国主义精神	020
第一节 高举爱国主义圣火复国兴邦的越国实践	021
一、以“兴邦复国”的伟大目标凝聚人心	021
二、以人为本的基本国策	022
三、坚强、智慧的领导核心	023
四、符合实际的复国之策	024
五、务实节俭 埋头苦干	024
六、农商并举 兴商强国	025
第二节 施行仁政 称霸百年	026
第三节 越国实践的重大贡献	027
一、越国实践与“百家争鸣”的互动	027
二、越国文化 广泛传播	029
三、越国精神的主要内涵	030

四、义乌是越国复国斗争的重要基地	032
第三章 明星与群星	041
第一节 璀璨明星	041
一、诗人骆宾王	041
二、抗金名将宗泽	043
三、清官徐侨	046
四、医学大师朱震亨	047
五、“河神”朱之锡	049
第二节 义乌兵和敲糖帮	051
一、义乌兵	052
二、敲糖帮	057
第四章 流淌在大地上的文脉	060
第一节 义乌是干阑文化的发祥地	061
一、干阑的起源与特征	061
二、干阑文化凝聚百越先民的智慧	063
三、义乌是干阑文化的发祥地	064
四、干阑式建筑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北方地居建筑的交流	065
五、义乌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066
第二节 传统民居——农民创造的又一座文化高峰	068
一、商业的繁荣推动传统民居建设	068
二、义乌传统民居的特色	069
三、义乌民居发展的脉络与规律	074
第三节 清水白木雕——义乌农民精神世界的窗口	083
一、清水白木雕的起源	084
二、义乌清水白木雕的题材和内容	084
三、义乌清水白木雕是义乌农民精神世界的窗口	084
四、义乌清水白木雕的思想文化内涵	085

五、义乌清水白木雕的艺术成就	093
第五章 《共产党宣言》与义乌奇迹	097
第一节 《共产党宣言》与义乌当代三杰	097
一、陈望道	098
二、冯雪峰	104
三、吴晗	109
第二节 朱鸿儒、吴溶品和义乌农民运动	114
一、中共义乌县委第一任书记朱鸿儒	114
二、中共义乌县委第二任书记吴溶品	115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义乌农民运动	116
第三节 义乌人民的第三次抗日战争	117
跋	121
主要参考书目	124
图片来源	125
后记	126

第一章 灿烂的史前文明

中华民族是一体多元的民族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今天是由分布在我们广阔国土各地的 56 个民族组成的。从源头上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大摇篮。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文化区,分别为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和黄河流域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在长江流域,分布着两个重要的文化区,一为长江中游区,一为江浙文化区。上述五大文化区均属于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分布于珠江流域,同样是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和北方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主要分布于燕辽文化区)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

分布在辽阔区域的各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祖先,其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与社会形态、家居形式、生活习惯、风俗信仰乃至思维方式等等,都各有特点,他们世代传承,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通过交流、整合、融合,大家最终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各民族认同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

义乌是我国稻作文明和干阑文化的重要源头。义乌先民,早在 11 000 年之前,就开始种植水稻、建造木构干阑屋居住,实现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和由采集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型,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

第一节 浙江在我国史前文明发展中的重大贡献

江浙文化区域内的浙江,地处东海之滨,45 万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生活在距今约 10 万年以前的“建德人”,在今天浙江西部山地,开创了远古浙江文化的先河。此后,浙江先民活动的中心先后转移到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丘陵地区和更靠近大海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距今 7 000—5 800 年,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活跃着马家浜文化;距今 7 000—6 000 年,宁绍平原地区活跃着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5 900—5 200 年,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文化发展进入崧泽文化阶段;距今 5 300—4 000 年,良渚文化将浙江史前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谈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明,人们最为熟悉的当属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的河姆渡渡口北侧,1973

年被发现。此后,在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先后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 47 处。

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有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距今约 7 000—6 500 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 6 500—6 000 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 6 000—5 500 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 5 500—5 000 年。第四文化层出土文物最为丰富。仅第一期发掘就发现陶片 10 万余件,复原成形的陶器达数百件;遗址中发现了稻谷、稻壳、稻秆堆积,堆积厚度一般在 40—50 厘米,最厚处达 80 厘米。与此密切相关的发现是骨制的耜、刀和镰等农业生产工具,足见当时稻谷的栽培水平、规模和它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河姆渡文化遗址由此而被确认为世界稻作文明的源头。

在第四文化层中还发现了 6 幢木构干阑式建筑,其中一幢长 23 米多,宽 6.4 米,檐下还设有 1.3 米宽的走廊。

浙江地区的先民为崇拜太阳、以鸟为图腾的於越族。於越族是百越族群的一个分支。百越族是我国古代南方各民族的统称,其分布地域十分广阔。从今天的越南北部到浙江、江苏的广大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海南和台湾等地,以及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均为百越族群的聚居地。所以,《汉书·地理志》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为了适应南方炎热多雨的环境,发挥木材、竹材资源丰富的优势,百越各族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干阑式民居的居住形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点的干阑文化。

干阑式民居以其“立柱架屋”和楼居的特点,与北方的地居式民居共同构成了我国传统民居形式的两大体系。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浙江地区的干阑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榫、卯形式多种多样,柱与柱、板与板、柱与板之间均可以以榫卯形成紧密的联结,结构为牢固的整体(图 1-1)。考虑到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面对这样的考古发现,建筑专家们在震撼之余,发出由衷的赞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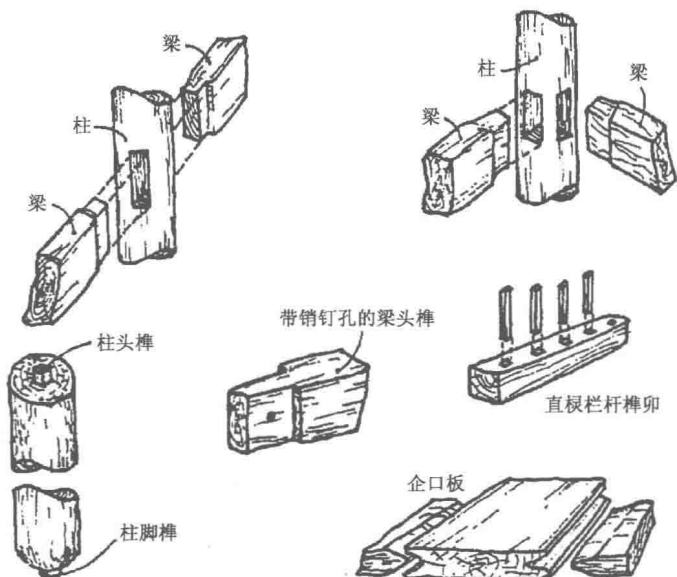


图 1-1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木构干阑榫卯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当时浙江的干阑文化在百越族群各地、各族的干阑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

距今 5 300 年前,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发展进入了良渚文化时期。截至目前,在余杭良渚,在湖州、杭州、嘉兴、海宁、绍兴、宁波等地,一共发现了 50 余处良渚文化遗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余杭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良渚文化遗址群。

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群总面积达数十平方千米,由若干个不同的功能区块组成:有普通村落区,有大型宫殿式建筑区,有多处玉器作坊。在聚落中,一般人、中小贵族和最高层贵族的墓地分布于不同的区域。显然,整个聚落群是按照功能分区的规划原则建造起来的,与过去按照血缘关系组织原则规划聚落的做法截然不同,它更接近现代城乡建设的规划方式。

该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出土了大量以玉琮、玉钺、玉璧为代表的玉器

良渚社会中的玉器,尤其是玉琮、玉璧和玉钺之类的重器,不仅象征着财富,同时还象征着权力,是军权或神权的象征物。最上层贵族颁布法令、调动军队,都会出示或派发特定的玉器,作为凭证。这样的玉文化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是中华传统玉文化重要的源头(图 1-2)。



图 1-2 雕刻神人兽面纹的良渚玉器

2. 出土了石犁

2003—2004 年,考古工作者在一处灰坑内发现了一把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石犁,石犁通长 106 厘米,其头部由 3 个部件组成,犁头有 3 个穿孔;木犁底部长 84 厘米,其尾端有装置犁辕的榫口。石犁的发现,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经由耜耕时代进入犁耕时代,这是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是农业技术水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产业,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粮食供应的充足,使制陶、制玉、纺织等手工业可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分工不仅使手工业制造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改变了产业结构,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

3. 等级分明的大型墓葬群

在一些大型墓葬中,墓穴多为长方形土坑,葬具多为涂朱棺木,少数设有亭室。随葬品有陶器、石器、玉器、象牙器、嵌玉漆器、丝绸等等:随葬陶器有鼎、豆、罐、缸和甗等多种类型;石器均为穿孔石斧;玉器在随葬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琮、钺、璧等重器,也有额饰、冠饰以及璜、镯、带钩、珠、管、坠等饰物。这些随葬品数量很大,制作均十分精美,反映出当时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已经很大,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反映出:良渚社会的阶层划分已经更为明确,更为深入和普遍,不再局限于中心聚落。社会最上层贵族的身份地位血缘世袭,他们掌握着社

会最高的宗教神权和军权,拥有巨大的财富,包括玉器、象牙器、漆器、精制陶器以及丝绸;他们驱使大量人力修建宫殿、城防和自己的墓地等大型工程,并且制定了一套用以规定不同社会成员享用不同等级、不同数量的葬具和随葬品的制度。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被公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它证明:在7000年前的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在今天的浙江省,已经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这一发现改变了过去人们关于中华民族摇篮的认知,形成了新的结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2007年,考古工作者在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发掘出一座南北长1500—1700米,东西长1800—1900米,总面积约3平方千米的古城。古城的城墙厚度达到40—60米,其底部以石块垒成,墙体为夯土墙。对城墙中出土的陶片和瓷片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座古城的年代大约在4000年前。

城墙的修筑和城市的出现是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上述古城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良渚文化后期,已经有了初级形态的国家,良渚文化晚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有研究者认为:“在良渚文化中晚期,应已形成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和习俗、共同的经济基础……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部落王国的时代,是‘原始的国家’或‘形成中的国家’。”^①

良渚文化将江浙文化区的史前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 金衢盆地是浙江史前文明的源头

人们将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别列为浙江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的代表,它们都分布在浙江近海的平原地区。那么,浙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源头又在哪里呢?

在金衢盆地。

金衢盆地位于浙江省中部偏西,是浙江省最大的陆相构造盆地、最大的中生代沉积盆地,盆地呈狭长带状,自东南至西北向延展,北接千里岗山脉、金华山脉,南依仙霞岭,东至会稽山,西临江山港、常山港,总面积约为7000平方千米,物产丰富,素有“浙江聚宝盆”之称。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地处金衢盆地东部的浦江县发现了上山文化遗址。此后,在金衢盆地区域内又先后发现了十余处上山文化遗址,它们集中分布于金衢盆地区域内钱塘江的主要干流衢州江、武义江、东阳江(又称义乌江)两岸。这十余处遗址的选址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多分布于平原边缘坡度和缓的山前台地,海拔高度在40—100米之间,遗址点到最近河流支流的距离在30—1600米之间(大多在1000米以内),遗址点到最近干流的距离在900—15000米之间(多为2000—6000米)。显然,上山人的聚落选址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靠近支流,远离干流”是他们为自己的聚落选址时共同遵守的原则。

浦江上山文化遗址位于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与三友村之间。遗址附近地势平坦,

为钱塘江一级支流——浦阳江上游河谷盆地，海拔约为 50 米，遗址面积约为 20 000 平方米。2001 年、2004 年、2005—2006 年，先后进行了三期发掘，发掘面积为 1 800 平方米。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三个阶段的遗存堆积。主体遗存是遗址下层。对遗址出土夹炭陶片和木炭标本的碳 14 年代测定表明，其存在年代距今约 11 000—8 600 年，是浙江省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图 1-3 至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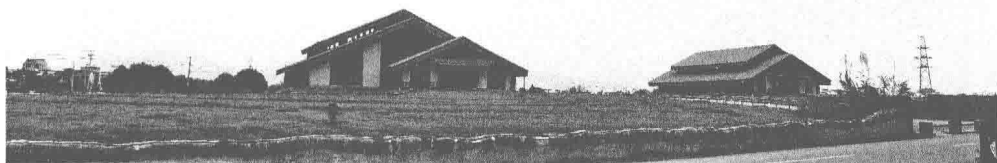


图 1-3 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公园



图 1-4 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公园
A 馆内保存的发掘现场



图 1-5 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公园
B 馆内保存的发掘现场

上山文化遗址表现出明显的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

在上山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数量众多的陶片和石器。

石器分石片石器、石核石器、砍砸器、尖状器等。同时，还发现相当数量的磨盘、磨棒、石球、穿孔石器等。磨盘的磨面呈凹弧状，底面未加工，保持石料原状（图 1-6 至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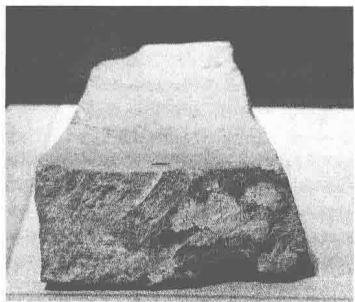


图 1-6 砥石（磨制石器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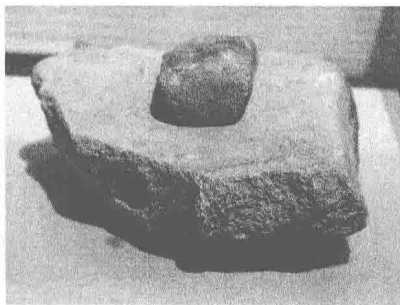


图 1-7 石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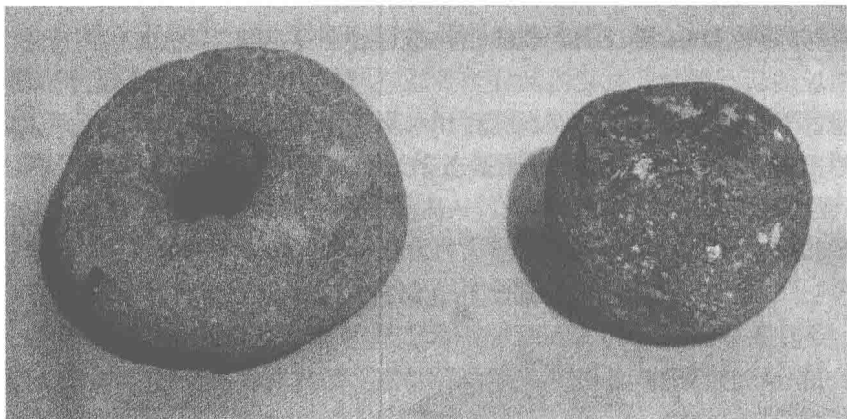


图 1-8 穿孔石器、石球

陶器的种类、形态相当丰富,有平底、圈足、圜底器等多种形式,有大口盆、双耳罐、平底盘、镂空圈底盘、陶钵、陶杯等等。陶大口盆是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中具有代表性的陶器,有无耳、单耳、双耳、三耳等多种类型(图 1-9 至图 1-15)。



图 1-9 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代表性陶器——陶大口盆



图 1-10 单耳陶大口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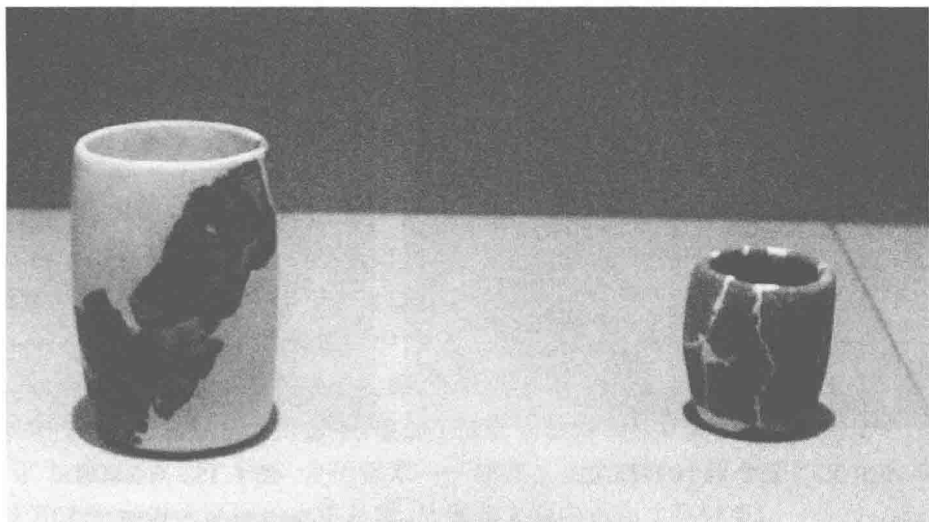


图 1-11 陶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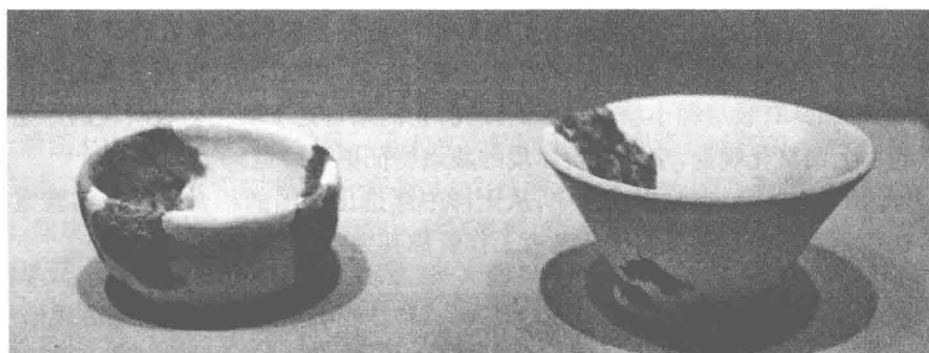


图 1-12 陶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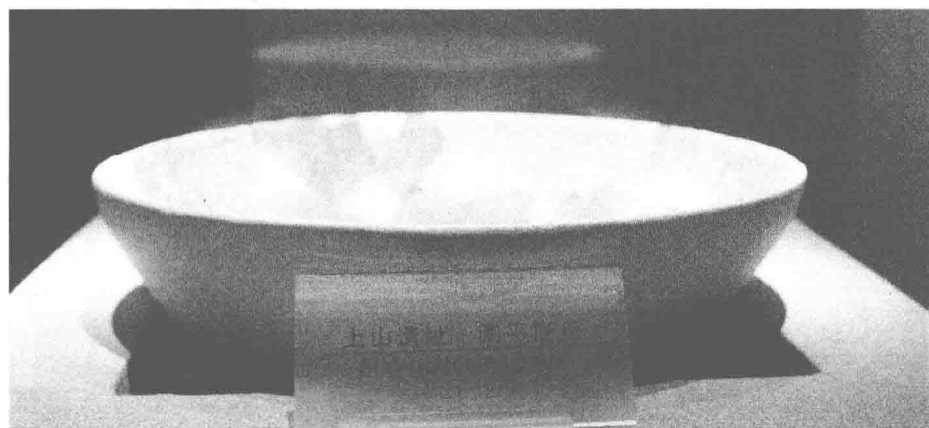


图 1-13 陶平底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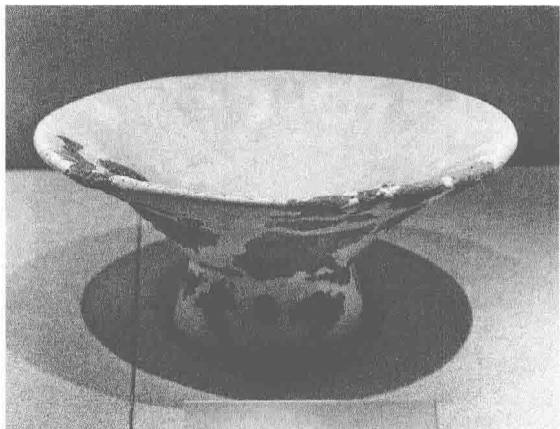


图 1-14 陶圈足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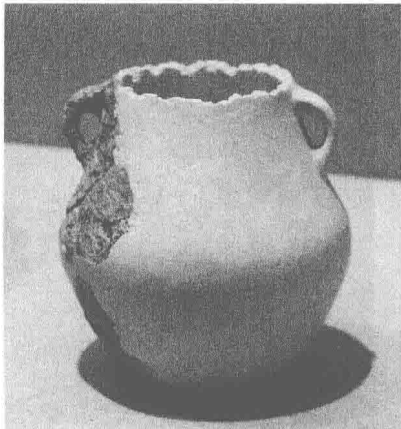


图 1-15 陶双耳罐

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的陶质大多为外红内黑的夹炭陶。在夹炭陶片表面，存在稻壳印痕；同时，胎土中屛和有大量的稻壳和稻叶。之所以要在陶土中加入稻壳和稻叶，是为了防止陶器在烧制过程中开裂。由此，形成了夹炭陶。

研究发现，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中的稻壳是脱粒取米后的碎壳。分析表明，这些稻遗存所反映的生物特征有明显的驯化迹象：在稻壳中，发现了具有野生稻特点的小穗轴和具有栽培稻小穗轴特征的颖壳，它们来自处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粳稻（到了上山文化晚期，小穗轴所体现的栽培特征更为确定）。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发掘过程中，从土样中浮选出残损的稻米一粒。实验室分析表明：这粒稻米来自早期栽培稻。考古工作者称其为“万年稻米”（图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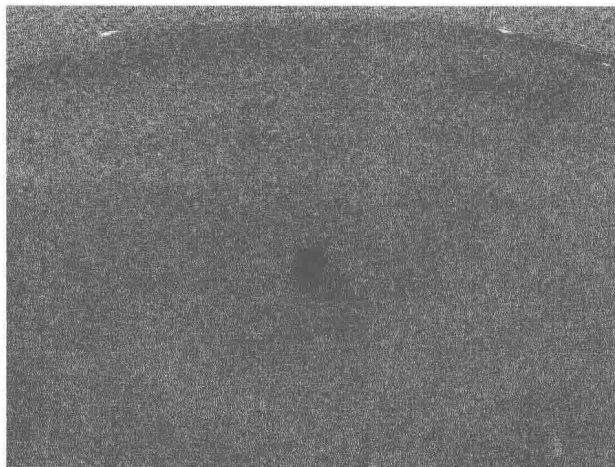


图 1-16 “万年稻米”

透过高倍显微镜观察：在上山遗址出土的镰形石器、石片石器等器物上，存留有水稻植硅体以及禾本科植物的痕迹。有理由认为：这些石器是水稻收割工具。当时收割的方式，可能是掐穗收割。这种掐穗收割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至今，在广西侗族聚